

新闻传播学译丛

脱口秀

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美〕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著

苗 棣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新闻传播学译丛

脱口秀

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美] 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著
苗 棣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 (美) 斯克特著；
苗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

ISBN 7-5011-4293-9

I. 脱… II. ①斯… ②苗… III. ①广播对话—广播节目—
研究 ②对话—电视节目—研究 IV. G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928 号

Can we talk?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talk shows

Copyright ©1996 Gini Graham Scot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9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脱 口 秀

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美] 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 著

苗 棣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43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93-9/G·1582 定价：20.00 元

译者序

港台的翻译家在翻译外来词汇时常有音义双通的奇想，“脱口秀”就是其中之一。talk show 是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译作“脱口秀”不但声音相近，也颇为形象生动，因此在我们的广播电视界业内以至一般受众中，这个有点古怪的外来词汇已经基本上被接受。

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媒介的发轫期，但真正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却是 80 年代的事情。在广播中，以拉瑞·金和林堡为代表的政治性谈话节目大多代表保守主义的立场，为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加进了一些更为令人不安的因素，甚至引起克林顿政府的关注和指责；而电视自 80 年代勃兴的日间谈话节目，也因其对揭示个人隐私的特殊兴趣而被一些人称为“电视垃圾”，受到强烈抵制。那么，种类繁多的广播和电视脱口秀到底是毒药还是清凉饮料？它们为什么会当代美国社会中成为如此重要的一道文化景观？脱口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分成哪些类别，各有什么特点？那些超级谈话主持人为什么

能够登上明星的巅峰？谈话节目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社会？这些问题就成为当代一些美国学者关心的话题，一批相关的专著也应运而生，斯克特博士的《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就是最近出版的这样一部著作。

吉妮·斯克特是一位著述极丰的著名女学者，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和传播媒介的许多方面。她做过许多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并且独立制作过广播谈话节目，自任主持人。这方面的经历和深厚的学术基础使她在这部著作中能够对各式各样的脱口秀进行生动具体的描述，并且以公允的眼光作出有深度的分析和评价。在书中，作者不但介绍了谈话节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进程，介绍了拉瑞·金、拉什·林堡、哈沃德·斯特恩等超级广播明星和巴巴拉·瓦尔特斯、奥帕拉·温弗丽、莉基·蕾克、大卫·莱特曼等超级电视明星，而且分门别类地描述了各类广播、电视脱口秀的内容和样式，以及它们的操作方法和经营体制。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描述和评价谈话节目的时候，始终没有脱离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背景，让我们得以了解，每一种媒介谈话的成败兴衰以及它们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状态，都是社会与媒介间互动的结果。这不仅引发我们对于美国社会进程的兴趣，也引起我们对于媒介应该如何顺应社会潮流、又如何影响社会的思索。

当前，在我国的广播和电视中，谈话节目正呈兴旺发达之势。自90年代以来，电台广播中的嘉宾和电话参

与型谈话节目茁茁如雨后春笋；而在电视里，不但有了《实话实说》这样的大型谈话节目，各类时政、社教、文艺、体育节目中也大量引进了谈话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广播电视工作者一面在实践中探索，力图找到适合国情的节目形态和创作规律，同时也亟需了解国外同类节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借鉴。我在1998年《现代传播》第四、五两期上发表《话语的力量——美国电视的夜间谈话与日间谈话节目》一文后，许多专业人员表示，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到更丰富、更具体的有关信息，《脱口秀》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对于专业工作者，它是研究和借鉴的极好资料；对于那些对广播电视或是美国社会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它也同样是一值得一读的作品。

为了体现媒介文化的及时性，这部书是在极短时间内赶译出来的，难免有诸多疏漏和舛误。感谢编辑黄春峰先生为之做了大量校正工作，也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苗棣

1998年11月17日于北京定福庄

目 录

译者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创造一种愤怒和痛苦的气氛	(8)
一批孤独、焦虑的观众的产生	(9)
我们怎样成为愤怒、焦虑的受众	(12)
全国之声的失落	(17)
回到媒介的愿望	(21)

上编 广播谈话

第二章 一个谈话者的国度	
广播谈话节目的发端	(27)
公众谈话节目的源头	(27)
美国的早期谈话	(29)
广播节目的开端和它的黄金时代	(31)
电话参与节目的开端和 50 年代的广播谈话节目	(36)
第三章 60 年代以来的广播谈话	
政治, 心理学, 成功和“震撼大侃”	(39)
60 年代政治谈话节目的出现	(39)

反主流广播谈话的兴起	(40)
70年代广播节目的变化	(45)
80年代的成功、幻灭和“震撼大侃”	(49)
不断增长的谈话节目影响力	(55)
第四章 超级明星的诞生	
拉瑞·金、林堡和斯特恩	(59)
从迈阿密到主流美国：拉瑞·金的崛起	(60)
拉什·林堡的发展	(64)
哈沃德·斯特恩和“震撼大侃”谈话	(74)
小结	(83)
第五章 人民之声	
全国人民在说什么	(84)
人格的魅力和参与的力量	(84)
对一个节目的剖析	(86)
说出来：为苦闷、悲痛和政治倡议	
提供一个空中论坛	(92)
帮助我：解决个人问题和缓解冲突	(102)
把握国家政治的脉搏：左派广播谈话	
和右派广播谈话	(112)
对于社会问题的发泄和反应	(116)
减轻在危机中的恐惧：谈论无名爆破者事件	(118)
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谈论 V 芯片	(119)
向专家学习：有特殊知识的嘉宾的节目	(121)
作为专家和倡导者的主持人	(123)
小结	(124)
第六章 与谈话节目主持人谈话	(126)
对广播谈话节目的反响	(126)
为全美谈话节目主持人事业的发展服务：	

采访卡洛尔·内什	(128)
技术革新带来广播谈话的转变：	
采访琳·戴斯特勒	(129)
制作人的角色	(132)
做全国性谈话节目的主持人	(139)
继承传统	(144)
广播谈话节目的影响力	(148)
第七章 适当其位	
地方广播节目和特色广播节目	(153)
主持一档地区性节目	(154)
播出一个自己的新节目	(169)

下编 电视谈话

第八章 电视谈话的开端	(183)
20年代和30年代：电视的发轫	(183)
新媒介实验	(186)
三大广播网的兴起和战时电视的消沉	(187)
战后电视的转机	(190)
商业电视的开端	(191)
50年代的快速发展：走向商业电视	(195)
50年代的电视谈话	(199)
其他方向：从巨奖电视到低成本电视	(201)
第九章 电视谈话的兴起	(206)
60年代电视谈话的威力	(206)
记录美国文化的变迁	(209)
60年代，变化中的美国	(214)
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	

一个变革与巩固的时代·····	(220)
反电视运动的开始·····	(223)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的状况·····	(225)
80年代的谈话新浪潮·····	(226)
第十章 大明星	
巴巴拉·奥帕拉、莉基和大卫·莱特曼·····	(234)
大突破：巴巴拉·瓦尔特的故事·····	(235)
由贫穷到显赫：奥帕拉·温弗丽的崛起·····	(246)
开掘新市场：莉基·蕾克脱颖而出·····	(253)
把幽默与谈话结合在一起：大卫·莱特曼的成功·····	(263)
小结·····	(271)
第十一章 看看谁在谈话	
今天的娱乐脱口秀和信息谈话节目·····	(272)
不同类型的节目·····	(273)
新闻—信息节目·····	(275)
杂耍—喜剧—访谈节目·····	(283)
人际关系和心理节目：从娱乐到自助·····	(290)
第十二章 垃圾脱口秀到底有多坏 ·····	(295)
娱乐和戏剧化节目的问题所在·····	(295)
娱乐还是低级趣味·····	(300)
在人际关系中把娱乐和理解结合起来·····	(309)
小结·····	(314)
结论 我们将走向何处 ·····	(315)

引 言

电视和广播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新权威。它们像是城镇议事厅或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我们可能不认识隔壁的邻居，我们可能也根本就不想认识他们；我们也许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们是潜在的罪犯。但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却是受欢迎的客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难于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怎样行事。

与此同时，在这些谈话节目随着广播和电视媒介的发展而成长的过程中，也逐年纪录下美国人在不断加深的混乱中日益陷于困境的历史。因此，它们在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件并让我们感到些许安全与慰藉的同时，也挑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恐惧。这是因为拥有吸引亿万人倾听力量的谈话节目，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既能造成伤害，又可以给人帮助。谈话节目也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谴责，特别是那些接入电话的政治性广播脱口秀和日间电视脱口秀，因为前者在不断激起愤怒和恐惧，而后者则破坏了伦理和人际关系。

在电视领域，当《杰尼·琼斯节目》的一位嘉宾约纳坦·史密斯杀害了另一位嘉宾，他的32岁的邻居斯科特·阿马多尔之后，这类日间脱口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抨击。史密斯被邀请参加那次谈话节目，要在节目中去会见一位暗中的倾慕者。他本以为倾

慕者会是邻里中的一位女士，很有些得意，谁知道那位暗恋者却是一位男性。在主持人精心安排的这次意想不到的会见几天以后，他闯入那位邻居家，用一支 12 口径步枪杀死了阿马多尔，而后投案自首，但他不认为自己犯有一级谋杀罪。

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于：鉴于《杰尼·琼斯节目》通过挑起情感碰撞毫不负责任地展示他人的心理伤痛，又不做任何善后处理，它是否直接导致了这次严重的事故呢？在事件发生后，一大批心理学家在谈话节目和印刷媒介中表示了肯定的想法。这一事件也引起许多媒介批评家对那些个人关系谈话节目在总体上提出疑问：通过那些敏感的话题和被集中到一起的嘉宾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到底会给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伤害？在个人关系谈话节目仍在继续的时候，人们仍然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在广播谈话方面，由于对性行为、犯罪、家庭破裂、社会腐败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运动的恐惧气氛日益浓重，人们对于那些直露的性谈话和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谈话节目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在这种恐惧、抑郁的总体氛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震撼大侃”，例如哈沃德·斯特恩，他可以非常公开和肆无忌惮地谈论性及其他涉及隐私行为的话题。虽然广播隐私谈话和广播政治谈话都可以说是面对现代焦虑的一种反应方式，前者是为了放松，后者是为了公开表达愤怒，但很多人都担心，这些谈话节目本身已经有点失控了。例如，当保守派政治家、宗教领袖和普通公民被斯特恩一流的性谈话节目搅得心绪不安，认为这些节目正在颠覆着家庭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却感到了反政府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政治谈话节目的威胁。这类节目充满了反对税收和要求摆脱政府控制的信息，对联邦调查局、信息纪录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大施挞伐。事实上，许多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这些日益增长的反对政府权威和摧毁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谈话节目，已经刺激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从袭击堕胎诊

所直到白宫枪击事件和奥克拉荷马城的大爆炸。就连克林顿总统也对许多保守主义谈话节目主持人作出指责，例如拉什·林堡和 G·戈尔登·利地，认为他们反政府的花言巧语引发了那些过激的行动。

但那些节目真有如此威力吗？还是它们仅仅反映了美国和全世界不断加剧的失望情绪和功能紊乱？或许这些节目能通过它们的威力帮助我们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如今，尽管攻击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的声音不断加强，业内人士却公开宣称，这类节目对于社会是有益的。

同时，这场关于谈话节目的大辩论也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大背景下理解这些节目。不论广播还是电视，都成长于美国和全世界所经历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和技术大变革的时代。广播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年代和 30 年代，当时美国正处于由只重物质增长的孤立主义政权向世界大家庭成员过渡的时期，同时还经历着引人注目的文化变迁和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而电视则是在 50 年代，另一场引起世界分裂的战争之后，在一个相对稳定、纯真，对社会正在出现的裂痕视而不见的时代兴起的。在 60 年代，电视业迅速扩展，它那种展示即时新闻的能力有助于纪录那个时期正在兴起的反政府运动和日益加剧的个人孤独感。

现在到了 90 年代，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只是更加严重了。而这些深切的痛楚就戏剧性地反映在当前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内容里，也反映在人们对于广播和电视的恐惧中。也许我们对于这些节目信息和信息传达者的极大关注，是由于我们不愿意在镜子中看到它反映的世界。于是，人们对着这面镜子发出嘘声和喊叫，砸碎它，遮盖它，封闭它，这样我们就能够只看到我们想看的東西，而不去努力适应镜子中反射的现实。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却正是在最近才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它们的能力也引起了巨大的恐惧。直到 90 年

代初，谈话节目还基本上被限制在夜间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或是在一些公众不太感兴趣的电台播出。那时候，典型的谈话节目大多是通过访谈或是集体讨论的方式面对一些严肃的问题，它们更像是新闻或是社会服务节目的附属品。在那个时代，广播业把大笔资金投向流行音乐，而电视业则把钱主要用在大众游戏节目、喜剧和电视剧方面。

但是在最近几年，要在广播和电视中感受到真实生活的听众和观众却在与日俱增。突然之间，人们想要听一听其他人——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普通百姓——要说什么。在有线电视网和全国性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积极参与下，谈话节目的数量猛增，最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随之成为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超级明星，例如拉什·林堡和哈沃德·斯特恩，都出了书，赚了大钱。不过他们的成名也引起了一个反明星运动的兴起，例如一个独立的媒介观察组织“公正准确报道协会”，就对拉什·林堡的许多错误言论进行了讨伐，并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事情并非如此：拉什·林堡的谬误王国》。

与此同时，希望通过在谈话节目中现身来博得名声和金钱的人也在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供所有的人欣赏。事实上，人们对于所有的生活难题，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其中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我们不但喜欢看到一个人战胜困境或是一个小人物成为胜利者，而且也想要看到人们的恼怒和痛苦——因为那能使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困难和缺憾时感到好受一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谈话节目是在一个无序、绝望、愤怒的时代里为社会和个体提供的一种解毒剂。

这种解毒作用体现了脱口秀节目积极的一面，由于它们建立起了一个全国性谈话系统，使人们对于现实事物有了更多的了

解，也使他们对于节目中涉及的人际关系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

但消极的一面也在不断扩大。在为吸引更多观众而进行的竞争中，许多谈话节目正在把社会分裂和个人痛楚聚光在公众面前，并使得现实的问题更加严重。举例来说，有些谈话节目在为暴力和反政府行为辩护方面走得太远了，甚至导致一些热衷于使用暴力的分子，去杀害堕胎医生或是去爆炸建筑物。另一些谈话节目则过分热衷于暴露嘉宾或是电话来访者的隐私，无所顾忌地让他们当众丢脸，或是张扬他们已有的过错，最终制造了一些犯罪事件。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杰尼·琼斯节目》事件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宗毓华引发的一场争论。在代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纽特·金里奇的母亲进行采访的时候，宗毓华要她谈谈对于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看法，并且对她说：“我们关掉录像机，只作为一次私人谈话。”金里奇的母亲谈了，而且她的谈话立即在全国播出了，并引起人们对于电视主持人要不要信守诺言的问题说长道短。^①在日复一日的各式脱口秀中，人们现在似乎正在把他们最隐蔽、最阴暗的秘密——从乱伦的私情到过去的犯罪行为——公之于众。有时候人们也在节目中大谈其他人的隐私或是放肆地指责他人的过错，例如许多男人在那些日间节目中抱怨他们的妻子或是女友太胖或是太邋遢。

此外，在广播方面，人们最担心的是谈话节目中愤怒情绪的升级和它对于暴力和社会动乱的潜在影响力。有些人认为，在政府攻击大卫·科拉什及其追随者在德克萨斯州的瓦科营地和兰地·维瓦尔在爱达荷州鲁迪里奇的据点之后，一些广播谈话主持人公

^① 译注：宗毓华是CBS著名的华裔女新闻主持人，金里奇为共和党议会领袖，众议院议长。在1995年初那次著名的谈话中，金里奇的母亲把希拉里说成是“一只母狗”，因而引起轩然大波。不久后CBS因种种原因终止了宗毓华新闻主持人的职位。

然煽动人民武装起来对抗政府，直接导致了1995年4月19日奥克拉荷马政府大楼的爆炸事件，那次事件正好发生在攻击瓦科的两周年纪念日。另一些人，包括自由派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家以及克林顿总统，则对G. 戈尔登·利地在广播节目中宣布对付联邦特工人员跟踪的最好办法是把他干掉的做法大为恼火。

不过，在事情的另一面，是许多人认为广播主持人的讲话维护了言论自由。正因为如此，全国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协会才会在第7次年会上决定把1995年度自由言论奖颁给利地（他的节目在全国广播谈话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拉什·林堡）。协会对于他大胆直言的努力表示支持，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与其说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还不如说是暴力犯罪的倡导者。

类似的天使还是恶魔之争，同样发生在对于哈沃德·斯特恩和其他一些“震撼大侃”的评价上。1993年10月，当联邦通讯委员会为了斯特恩节目中露骨的性话题而对其电台罚款170万美元的同时，他的第一部自传《隐私部分》在上市后就成为卖得最快的畅销书，据报道，一家纽约书店在开门时有6000人排队等着买书，而两个月之后，在帕萨德纳的另一家书店，则来了8000到1万人。斯特恩先生后来又出了第二本畅销书《美国小姐》，他的广播谈话还被E!有线电视网拍摄下来播出。

争论还在继续。广播和电视的脱口秀是在建立全国性对话还是在污染这种对话？它们反映了社会的关注热点，还是让美国社会越来越失去应有的功能？

当然，一些脱口秀主持人正在成为新的超级明星，并且随着实力的增强而把广播谈话移植到电视中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和大牌政治家，从左派的马利奥·考莫和杰里·布朗到右派的奥利弗·诺兹，也把他们的明星效应带到全国和国际性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中。

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这些情况到底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

了什么事情？脱口秀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作为个体和整个社会，我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这些节目又是在怎样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和克服所面临的危险的？

这本书就是要通过探索当今谈话节目的状况以及它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来讨论以上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些节目是反映我们生活问题的一面镜子，是让我们弄清楚什么事情正在变坏的一个窗口，有时候，它还能加剧这些问题本身，或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些主持人和制作人有力去做所有这些事情。而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也有力量去选择接受哪些节目。

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开阔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今天的脱口秀掌握权力的历程，然后着重分析它们拥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原因。它们传达了什么信息？都有哪些谈话样式？什么因素使某个节目特别知名？不同种类的脱口秀有哪些不同的听众和观众？人们是怎样参加进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或是嘉宾是什么样的？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和一个社会，怎样才能利用这些节目的威力来解决当今的诸多问题？

在下面一章中，我们先观察一下造成谈话节目崛起的社会背景。然后在第一部分里讨论广播谈话，第二部分讨论电视谈话。虽然这本书是为普通听众和观众，特别是美国受众写的，但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大众文化学专家也能从中发现特殊的兴趣点，也就是说，可以对现代电子媒介谈话的威力多一点了解。

第一章

创造一种愤怒和痛苦的气氛

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是听众放松身心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一个途径。在今天的地球村里，这些节目还起着古老时代社区议事场的作用，人们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现实问题，交流闲闻逸事，或是谈论哲学、艺术和文学。

但大多数人还是单纯的收听者和收视者，就像那些看着别人交谈的旁听者一样。最新的受众调查，例如1993年时代米罗群众和媒介调查中心的研究表明，只有大约11%的美国人试图申请参加一个脱口秀，只有6%的人参加了节目的播出。然而，这些更愿意表现自己的少数申请者——根据其他社会调查，多是成年男子——主要是由那些感到更愤怒、更焦虑、更痛苦的人组成。他们对于逃避或改变痛苦的现实生活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因而想要参加谈话节目。

在广播的20年代和电视的50年代这些早期日子里，节目都以轻松有趣为特征。这种节目风格一方面体现了广播电视业和赞助商的水平，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美国公众的一种舆论气候，大多数美国人都继续执迷于在一个进步和民主的国度里追寻物质成功的“美国梦”。但如今比较轻松有趣的节目主要是电视中的游戏节目和夜间幽默谈话，以及清晨广播中谈话和音乐结合的音乐谈话节目。

而更多的谈话节目则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愤怒和苦痛。愤怒主要表现在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广播政治谈话和社会问题谈话里，在这些节目中人们表达他们的观念，认为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痛苦却主要表现在电视的人际关系和自助类谈话节目中，人们在这类节目中分享他们自己或是其他人的错误。

这些受众还表现出男性和女性在愤怒与痛苦的心理反应上大不相同。男人在感到愤怒和痛苦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公开表达，并且喜欢归咎于外部原因；而妇女却表现得更为内向，而且经常归咎于自己或是希望改善自己。因此，在政治性的“归罪于社会或政府”的广播节目中，听众和申请参加者多是男子，直接表达他们的愤怒。相反，电视中的人际关系或是自助节目的观众和参加者则主要是妇女，通过内省她们的痛苦，寻求理解，以期有助于改善她们自己或是她们的人际关系。

然而，不论这些谈话吸引男人还是女人，也无论它们让那些归咎于社会还是归咎于自己的人更满意，这种愤怒与痛苦的强大潜流有助于创造一个广播和电视脱口秀的巨大的听众和观众群体。

为什么呢？一些时事评论家，如《一个受害者的国度》的作者查尔斯·塞科斯，对造就这些热情受众的社会和心理学动力进行了探讨。当广播电视技术建立起一个能使受众感到松弛的公共议事场的同时，社会正在制造着大批愤怒、痛苦的人。

一批孤独、焦虑的观众的产生

这批愤怒、孤独，饱受焦虑痛苦的观众主要是由两大情势制造出来的。一方面，自从本世纪初以来社会更加复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感到无力把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也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

受害者，觉得应该被同情或是有权利责备他人的过失。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日益感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在主流媒介中得到反映，因而希望直接来表现自己。如果越来越有势力的媒介记者、时事评论家和新闻主持人不愿为他们说话，人们只好自己说出来。

在《一个受害者的国度：美国人格的衰败》一书中，威斯康星州的查尔斯·塞科斯教授描述了这个愤怒、焦虑的美国人群的兴起。这些人构成了那些可以让他们表达自己感受的脱口秀节目的核心观众群。虽然塞科斯没有把美国社会中正在加剧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与脱口秀的流行联系在一起，但只要听一听这类节目，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联系。

如塞科斯所述，这种受伤害者的大合唱早在 50 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因为人们越来越愿意相信，自己的美国梦正在破灭，觉得自己病态、不堪重负、沉溺于恶习而不能自拔。按照塞科斯的观点，这种幻灭感的产生也同心理学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解释和谴责人们的行为及个人的事业失败相关。

塞科斯指出，日益增多的失意者成为那些为各式各样的不堪重负的人和有行为缺陷的人组织的治疗小组的成员，被当成病人。这些组织，例如赌博者小组、未婚父母小组、负债者小组、精神崩溃者小组，都由那些自认为无法摆脱恶习或是要在失败中恢复的人组成。与此平行发展的，是另一大批人加入了破坏性的政治或社会团体，包括左倾的自由派团体和僵化的右倾保守主义团体，还有自由意志论者组织。左翼希望政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同时让生活方式保持更多的选择性。右翼则希望政府少管个人的事，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帮助恢复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伦理方面，敦促人们努力工作，保持社会责任和道德的性关系。但不论哪一方的成员，都对一些事情感到愤怒，并觉得政府或社会应该按照他们的方式做出改进。

这些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依塞

科斯所说，从 50 年代起，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认为“我是受害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错。”他们不愿为自己的困难承担责任，而是归罪于其他人的过失。他们对于价值观的判断大大敏感于对事情原因的判断，往往对于其他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或是其他不公正倾向过分敏感。

这些自称是受害者的人不但是脱口秀的听众和观众，也是这些节目的主动参加者。当他们一旦有机会在节目中露面的时候，就大谈社会如何从他们这些受害者群体中获利，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虐待、乱伦、父母带毒这类问题的伤害，痛苦终身。塞科斯指出：

不论是否真的遭遇不幸或是受到不公正对待，公开的受害者的行列正在继续扩大，不但社会弱势集团在宣称自己是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以及其他有心灵创伤的人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他们都在努力进行一场精致的受害者竞争游戏。明星们争着诉说自己在童年时被虐待的生动故事，同时电视谈话节目则把一队受害者公之于众，从苦难深重的乱伦受害者到性功能障碍的可怜人。^①

简而言之，人们日益增长的个人痛苦和对社会的怒气为这些谈话节目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但人们为什么会对受到伤害如此过敏呢？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信誉，日本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在经济上超过我们。那么为什么深刻的受难意识会让许多人转向谈话节目，把它当作表现所有这些愤怒与痛苦的窗口呢？

塞科斯的一个有力论点是：传统权威的崩溃和传统价值观的

^① 查尔斯·塞科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美国人格的衰败》，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丧失让我们感到迷惑又孤独，而整个社会的“心理诊断化”更加剧了这种不断增长的受害意识。我们人际关系中这种相互猜疑难以相处的状态，反过来又使我们彼此之间很难进行有效的交流。何况，随着美国人的烦恼的增多，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地因种族、阶级、性别或是其他类型的差别而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而人们都把自己定位在不同的受难集团当中。与此同时，我们被一股热情驱使着，相互叫喊，相互谴责，相互羞辱。

这种行为模式在许多脱口秀节目中得到反应，而且越来越情绪化，充满噪音。人们如此行事，是由于他们要向国人发泄，表达他们的软弱无力，自怨自艾。因为我们越来越把自己看成软弱和不健全的受害者。然后我们就经常把自己的痛苦，归罪于人际压迫、社会不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之类的外部因素，或是心理失调这样的内部因素，这样就能够为我们心中的无名怒火作出一种解释。同时，与他人一起怪这怪那，也让我们觉得自己与他人的感受相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越来越沉溺于责难他人或自我责难，以缓解内心的愤怒和痛苦的时候，这种心理动力却成了对付社会衰败和灾难的秘方。广播和电视脱口秀通过为我们提供表现自己感受的窗口，帮助我们应付难题。于是我们感到好多了。但潜在的问题却依然存在。于是我们继续把自己看成是愠怒、忧心忡忡的受害者。

我们怎样成为愤怒、焦虑的受众

按照塞科斯的解释，人们成为受害者的过程是从 50 年代开始的。从本质上讲，这一过程起源于 50 年代的社会一体化，并且在 60 年代迅速发展为对于自我的过分关心和对于外界满怀抱怨。

早在当年，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例如《组织人》的作者威廉·怀特和《美国中产阶级》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已经对这种不断发展的社会一体化过程进行了描述。由于新的大企业秩序的兴起，相互效仿，缺乏变化的一致性成为社会主流。有人甚至把这种状况悲观地描述为一个控制性的、专制的官僚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于世界的悲观看法却正是来源于那些大企业所造就的文化，虽然评论家现在对他们肆意攻击。正是联合企业促进了经济财富的增长，并且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在这种表面的繁荣下面，一股沮丧的潜流正在涌动，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例证，詹姆士·迪恩在影片《无由的反叛》中表现了肤浅的物质主义造成的心灵孤寂；而中学里流行起来的“摇滚文化”等亚文化现象，则显示了青少年对放松和快乐的追求。与此同时，社会批评家如大卫·雷斯曼在 1961 年出版了《孤独的喧闹》，指出在 50 年代的一体化文化中，一种新兴的官僚社会人格正在美国突起。雷斯曼解释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把他们的家庭或是传统当作生活导师。而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社会变成了企业家的天下，每个人都更需要通过内化新的社会规范，包括一定要努力工作并适应变化中的情况等等，从自我内部指导自己的行为。结果是个体要靠植根于强烈的“个性”意识中的内在定位仪器来指导生活，因而发展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在 50 年代，新兴的大众文化却引导出一种更注重他人的倾向，人们关注别人如何行事，以保证自己的想法合乎潮流，而不是依照家庭的或是传统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

由于人们特别注重与他人的一致，他们开始接受专家，特别是职业心理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建议，来做出个人的选择。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依赖于专家的心理治疗文化，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或是如塞科斯指出的，“心理治疗专家的兴起，似乎更能够使

我们接近和理解那个时代的核心偏见——自我。”^①

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激增也促进了这种对自我的兴趣的成长。因为在一个富裕稳定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大体定型，很少再用心思去考虑日常的生存或是谋求财富，于是他们只能转向心灵内部，为自我的改善与塑造而努力。

同样，家庭、传统宗教和教育机构这些价值观的传统发源地的沉沦，也造成了这种由社会向着自我的转移。这是由于传统理想与体制的衰败，使得自我成为价值判断的衡量器，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道德尺度和责任标准都在自我面前被质疑。

于是，50年代裹着糖衣的一体化，伴随着对被当成判断正确与错误的真正裁判者的自我的高度关注，为后来人们普遍感到的孤独、焦虑和沮丧开辟了道路，而开始于60年代的怀疑和反叛之风，则是这种状态的开端。

对自我的兴趣表现在“做你自己的事”这类流行语上。理想状态是尽情表现一个人不受拘束的创造性和情感波动，以达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自立。对自我的专注与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得到鼓励和喝彩。简而言之，以“发现和表现一个人的独立个性”和“真正的自由”为特色的个人主义被认为美妙无比。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自我的过分关注和生活的心理学化，使人们开始转而把几乎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精神或是情感的紊乱，于是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感觉自己有着某种心理问题。在自助性的电视和广播谈话中，这类情况多有表现。而且人们还及时地为这些心理问题取了上口易记的名称，例如，情欲过旺的妇女被称作“爱得太多的女人”；而有情感困扰强迫症的人则被叫作“难忘旧情者”。

人们对社会和心理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他们作为受害者

^① 塞科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美国人格的衰败》，第37页。

的感受也就越来越厉害，越普遍。当他们的理想没有实现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不满，由于他们不但曾经满怀期盼，而且认为自己“理当”得到满足，所以就会愈加失望。这就导致了70年代各式各样的自助书籍和心理专家大量繁殖出现。更糟糕的是，如果不能达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们就会进而嫉恨那些成功者，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罪于他人，而且痛感自己受到欺骗和伤害。而由于经济渐入低迷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膨胀的不现实希望难以实现。

此外，当那些并非受到严重伤害（例如重大事故的受难者）的人也被扩大到受害者队伍中来的时候，受害者的数量不断增多，而对这些人的支持和同情又给他们心中的愤怒和痛苦火上加油。传统上，人们会同情受害者，愿意帮助他们重新恢复状态或是缓解他们的痛苦。但现在的受害者往往通过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或其他节目，成为一个耀眼的故事主角。正如约瑟夫·阿莫托在其《受害者的价值》一书中所说：“苦难、不幸和遭遇成了加强个人戏剧性的营养剂……这是让一个人显得真挚、深刻的一种方法。受难使一个人显得严肃、有趣、煽情，或是具有一个肤浅、凡俗、注重实利的中产阶级成员实际上不具备的其他一些东西。”^①

将遭遇不幸浪漫化，曾经表现在反叛中产阶级传统观念的浪漫主义文艺中，在受难中显示出一种理想化的高尚德行。但现在，塞科斯认为，这种观念在社会中蔓延，并制造出一个受难者集团，人们一人其中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和抑郁得到他人的支持与认同。

许多广播和电视脱口秀中的嘉宾和参与者就是如此行事。他

^① 约瑟夫·阿莫托《受害者的价值》，纽约，普里杰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

们想与别人分享他们的愤怒、恐惧或是羞怯，而且许多人确实为他们的经历得到了近乎谄媚的回应，并且由于一直在忍受苦难而成为英雄，即使那痛苦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错误而非奋进造成的。这种态势让许多现代受害者进入到广播和电视的谈话表演中来，并让社会分享他们的受难史。

一个经典实例是斯托尔巴夫妇的荣耀。这对科罗拉多州的夫妇带着孩子在一场难辨方向的大雪中，为了急于赶路，不计后果地开车进入一条没有人迹的道路。他们的小卡车陷入雪中，而周围几英里内没有任何居民。后来，詹姆士·斯托尔巴穿过大雪寻求救援，而妻子和孩子则在一个山洞中等待。两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得救了。这里并不否认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也不否认他们克服了巨大困难才得以获救。但公众的兴趣并没有集中到努力去营救他们的救援者们的英雄主义上，而是把光荣给了受害者。

按照塞科斯的说法，给受害者荣耀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在对那些饱受煎熬的人们予以支持的同时，我们却对那些向他们的受苦提出疑问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审判。例如我们可以在比较保守的广播电视脱口秀中看到主持人和参与者的不同反应，他们对支持受害者的潮流不以为然，认为受害者也应该对自己那些引起伤害的行为负责，而不应给他们情感上的支持。在一些如《奥帕拉节目》或是广播自助性节目中，他们的观点与同情派的参与者形成对立。正因如此，那些觉得应该给受害者支持而非对他们裁判的人，对一些保守主义的节目提出了尖锐批评，对缺少同情心的主持人和参与者进行了强烈的攻击。

但保守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愤怒，虽然起因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成为受害者主要不是由于心理危机，而是源于失控的政府。于是他们同样对社会应该如何去做抱有很高的期望，然后感到失望，并以谈话节目作为公共会场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与痛苦。

全国之声的失落

广播和电视脱口秀还成为一种供公众交流的通气口，因为许多人觉得他们找不到一个谈话对象，对他们的想法做出反应。他们觉得大众传媒已经创造了一个由媒介明星和权威组成的精英阶级，如巴巴拉·瓦尔特斯和泰德·科佩尔，他们早已不接触普通人的想法。他们主要是与其他明星或名流交谈。相反，脱口秀却使普通人感到又能与其他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们交流和联系了。

一部研究新媒介权势人物的著作《媒介精英》，对这种失去沟通的现象做了高明的解释，其作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李奇特、史密斯学院的政治管理学教授斯坦雷·罗兹曼和华盛顿传媒与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林达·李奇特。他们指出：美国是在“完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中成长起来的，标榜“独立、自由、平等、私人财富和民主”，这一观念曾经广泛地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双方共同接受，这种态度导致“为大众的新闻”的发展，它基本上由私营企业拥有，而不像欧洲传媒那样与政府联系紧密。因此从一开始，美国传媒就受到利润动机的强烈影响，虽然有些报纸附属于政治党派，另外还有关心社会的天主教报刊，关心蓝领工人和穷人的利益。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因为人民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许诺和自由经营与发展的伦理，对于赢利动机的普遍首肯使得大多数报刊具有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倾向。于是那些实用主义的媒介就以反映过程的客观报道为特征，而不像欧洲那样，多为解释性、评论性新闻。

媒介的大众主义倾向的另一特点，是当时的报刊热心于揭露和谴责政治领袖，却从不对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提出疑问。与当今另一个重大不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一家全国性报

刊，而记者则大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并来自地方社区。他们与所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密切关系也就在报刊上表现出来。

尽管有 20 年代的文化变迁和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人们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基本信心却没有动摇，以地方大众文化为基础的媒介方式也没有变化。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特别关心纽约，甚至华盛顿的事情，照李奇特等人的说法，“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他们的社会的基础文化和社会结构是优秀的、正确的，并且把那些想要彻底改变社会的人当成怪物或是恶魔。”^①

这一理念反过来也在媒介的内容中得到支持，因为当时的媒介所有者和制作者，不论在报业还是在新兴的广播电台和电影公司，大多是保守主义者，而且几乎全部是男性。虽然在纽约和其他一些中心城市，已经有少数激进的小团体，在出版报刊，组织工人，并在罗斯福新政过后开始进入政府，但他们仍属于极少数。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技术的发展与人口激增的影响下，媒介开始了戏剧性变化。一个巨大变化是出现了新兴的媒介精英阶级，他们与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基础的接触越来越少。同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极大地影响着媒介，交通通讯情况的改善，例如喷气飞机的发展，汽车拥有量的扩大，全国高速公路系统的建立，都在削弱地域差异，加强区域间的联系，并且第一次造就了一个全国性受众群。

作为这一发展的反映，全国性媒介在 30 年代开始出现，并在战后高速扩展。广播把美国各地的住宅连接在一起，报业集团和新兴的全性大众杂志，如《时代》和《生活》，推动着一种新的全性意识的成长。当媒介变成全性的时候，其中大部分

^① 罗伯特·李奇特、斯坦雷·罗兹曼和林达·李奇特《媒介精英》，纽约，哈斯廷书屋，1990年，第6页。

以纽约为中心；另一些政治新闻媒介则以华盛顿为中心。

而后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电视的登场进一步加强了全国性媒介的力量。到 1958 年，美国的电视机数量几乎与全国家庭数量相等，而且在几年之内，电视节目的分配权完全被以纽约为中心的三大电视网——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所控制。同时，其他国家也发展起国家电视网，如英国的 BBC（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与分配的经济因素也促使电视权力集中。由于节目制作成本太高，地方电视台很快转向大电视网，播出它们的节目，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娱乐节目。

正如今天我们知道的，由于电视的可视性影响力的出现，全国性受众被空前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到 60 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了电视机，成人和孩子每天要看上六七个小时，而电视业的管理者还在殚精竭虑地用定位性节目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这种发展很快造就了一批专业化的、质地相同的媒介明星，他们越来越只是代表美国少数中心城市的文化，特别是纽约和洛杉矶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于那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特别是生活在小城镇中的美国人的观点，却颇有些不屑一顾。其结果是大批的美国人正在被忽视，那些操纵着新兴媒介并代表着美国大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媒介精英剥夺了他们的文化权利。

由于大城市价值观成为流行媒介的主宰，在其发展过程中，美国人曾经在家庭、社区和教堂中感受到的传统联系纽带被破坏了。更有甚者，媒介的新价值观认为传统价值观老派而无效用，这就使得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工人阶级或是生活在小城镇中的美国人，日益感到丧失了精神家园。对许多人来说，由于他们的地方文化和传统价值观遭到媒介中的文化观念排斥，因而时时要面对对立的判断，处于一种分裂的意识形态中。传播新价值观的媒介人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众把这些人当作英雄和行为典

范，有时会觉得与他们非常接近，尽管从来没有真正与他们见过面。这是由于包括新闻主持人、政治人物、好莱坞和电视明星在内的媒介名人，已经具有一种如学者理查德·梅莱尔曼所说的“假亲密的熟识”。^①

我们能够看到，在当今人们对于这些人物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们每天的行止去留、爱恨得失，都成为日常谈话的重要话题和《人物》、《全国询问者》之类的流行杂志和小报的主要内容。我们同情地关注奥帕拉·温弗丽痛苦的减肥过程，并猜测她最后是否会嫁给最近一个求婚者。我们跟着伊丽沙白·泰勒一道体验外科手术，还要为她会不会嫁给那个年轻人拉里·福坦斯基而争论不休。而对许多人来说，辛普森案件不仅是一个谜，也不仅是对真相的探索，他们把辛普森或是高德曼、布朗以及受害者朗和妮科当成某种意义上的代理家庭成员，与他们同甘共苦。

但这种对于媒介超级明星的盲目崇拜本身就能造成价值观的断裂，对于许多人来说，当这些偶像的规范和价值判断与大众文化为他们提供的规范大相径庭的时候，他们只能感到迷惑。这是因为，自60年代新媒介精英出现的时候起，这些越来越受过良好教育，越来越职业化，越来越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媒介精英们就在当时的人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激励下，倾向于持有一种综合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相反，那些热衷于广播电视大众文化，并把这种文化与自己的观念密切相联的受众，却是远离中心城市的“中层美国人”。

然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过程仍在继续。80年代初的几项调查纪录表明，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新闻工作者与普通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鲜明的不同特性，他们支持更激进的社会发

^① 理查德·梅莱尔曼《为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

展方案，赞同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性自由和环境保护运动。在1985年由《洛杉矶时报》进行了一项更广泛的调查，对全国大约3000名报纸记者、编辑与3300名随机取样的成年人进行比较，发现记者们比一般公众明显地更具自由主义态度。例如，他们更赞成政府对企业进行控制，却反对在公共学校进行祈祷，反对增加国防预算。

这样，由于媒介自身发生的技术方面与人员方面的巨大变化，造成了它与广大美国公众，特别是“中层美国人”的巨大文化隔阂。而正是这些受众热心地把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当作一个能够表现他们传统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那些传统理念现在正受到主流媒介的贬低和蔑视。

回到媒介的愿望

感到被抛弃的愤怒，对美国多年来发展方向的恐慌，以及想要重新获得一种声音的欲望，反映在一股横扫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大潮之中。这一趋势反映在方方面面，从政治格局的变化到议论美国出了什么毛病以及应该如何应付流行书籍的日益泛滥。共和党人革命使得他们在差不多40年来第一次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并让纽特·金里奇成为众议院议长。但这只是例证之一，另一个例证是近来金里奇的著作《再造美国》，其中表现出让国家返回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基础的强烈愿望，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案。而拉什·林堡的一些书，诸如《看，我告诉过你》和《还本归源》，用常识性格言表明，现在需要进行一次保守主义的更正运动。

保守主义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家卡尔·托马斯1993的著作《关系重大的事情》，是林堡诸书的前导。作者以一种与主流媒介精英对立的立场，向感到被抛弃的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直言：